



# 二战史观 环球学者说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

## 我们应持有怎样的二战史观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马子倩 记者 国新冠

随着美西方将中俄定位为“国际秩序修正主义者”，一套服务于地缘政治的错误历史叙事逐渐成型，集中表现为“忽视中国说”“西方中心说”“二战六年论”“日本受害论”四大扭曲史观。这些叙事并非学术疏漏，而是精心构造的政治工具，试图通过重构历史记忆削弱中俄的国际话语权。这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带领团队、历时5个月撰写并组织形成的一份智库报告的核心发现。

具体来看，“忽视中国说”长期将中国描绘成“轴心国的受害者”或“依靠盟军救援的弱国”；“西方中心说”过度凸显西方国家在二战胜利中的主导地位，对苏联和中国的历史作用予以淡化或矮化；“二战六年论”将二战起点单纯限定为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忽视了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史实；“日本受害论”则无视日本侵略罪责，片面渲染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悲剧，企图掩盖日本对亚洲其他国家的侵略暴行。

今年5月和6月，《纠偏：80年来错误“二战史观”的综述与中国应对之策》智库报告先后在中俄两国发布。其间，王文还在美国《国际政策文摘》、澳大利亚“珍珠与刺”网站发表了不同版本的评论文章，阐述关于二战的四大迷思至今仍在塑造着现代地缘政治。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王文分析说，四大错误“二战史观”的出现，根源在于冷战期间西方阵营对

二战历史的政治化解读和意识形态塑造，试图通过多元手段对苏联与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角色进行淡化、扭曲或抹黑，以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此外，社交媒体算法加剧了历史认知的“信息茧房”效应。西方主导的国际主流媒体使错误史观长期占据主流话语，难以被有效纠正。

“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和主要战胜国，为战争胜利和战后国际秩序建立付出了巨大牺牲。”王文指出，若不对“西方中心说”等错误“二战史观”进行纠偏，将产生多重负面影响，不仅会使中国在台湾问题、日本军国主义责任等涉及二战遗产的相关议题上话语权受限，同时会加剧西方对全球历史解释权的垄断，西方公众对中国抗战作用的认知将持续扭曲。

王文发现，二战历史传播国内宣传体系较为成熟，然而对国外的抗战历史传播覆盖面不足，传播效果有限。

为此，经过史料梳理、邀请历史学家进行权威论证与指导、多轮修改后，报告在最终版本中按照“整体—平台—传播—协作—追责”逻辑，提出多个反制建议，包括构建系统性历史叙事体系、从国家层面形成统一权威的外交叙事与传播机制；借力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主动发声；创新传播机制与技术赋能、吸引以Z世代为代表的年轻人参与历史记忆建构等。

“年轻人是未来国际话语权的主导者，其历史认知直接影响国际舆论走向。”王文说。



向中国无偿捐献二战相册的美国青年埃文·凯尔

## 中国抗战贡献被西方严重低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国新冠

曾无偿向中国捐献二战相册的美国青年埃文·凯尔，最近正忙着自己有关二战历史真相新书《敢为》的发行。近日，他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但许多美国人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一无所知。“我想通过出版书籍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二战亚洲战场的历史真相。”

2022年，埃文·凯尔偶然获得一本二战相册，翻开的瞬间，他便意识到其沉重的历史价值：“它不属于私人，必须回到博物馆去。”后来，他将这本珍贵的相册无偿捐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这让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再添新证。“对我而言，‘归还’这本相册从来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一项道德义务。这本相册必须被公之于众，以警示和教育世人，不能再重蹈战争覆辙。”埃文·凯尔说。

今年4月，埃文·凯尔来到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向该馆捐赠了包含日军军刀、历史信件等多件史料。这批史料是埃文·凯尔的事迹在国际传播后，有人找到他所征得的。

在美国，学生几乎学不到任何有关二战亚洲战场的历史。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等内容在美国学生的课堂上，要么

被一笔带过，要么完全被忽略。”埃文·凯尔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已经通过制作视频、撰写书籍等方式来让更多人了解二战亚洲战场的历史，并收获了热烈的反响。“这也让我意识到，人们渴望了解真相，只是需要有人向他们展示事实。”

在埃文·凯尔看来，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战、顽强抵抗，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当斯大林格勒战役、诺曼底登陆战役等历史事件为世界人民所铭记时，很多人却忘了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起到的重要作用被严重低估。”埃文·凯尔说，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角色很重要，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中国的顽强抵抗，二战的结局可能会截然不同。埃文·凯尔还强调说，二战结束后，中国始终在呼吁和平、铭记历史、追求正义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埃文·凯尔透露，未来他计划与中国相关机构、历史学家及博物馆等开展更紧密的合作，让二战亚洲战场的历史在全世界得到更多展现。“这不仅关乎历史，更关乎责任、正义与全球记忆。遗忘历史，就是纵容悲剧重演。我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柬中关系发展学会会长谢莫尼勒

## 必须时刻警惕侵略战争带来的浩劫

中青报·中青网驻柬埔寨记者 王岩

“中国人民铭记这段80年前的历史，绝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汲取深刻教训——警示世人，必须时刻警惕侵略战争带来的浩劫。”柬中关系发展学会会长谢莫尼勒近日接受中青报·中青网驻柬埔寨记者采访时表示，历史无法改写，未来却可塑造。当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复杂交织，局部冲突风险犹存，战争的阴霾并未完全消散之际，举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具有深远意义。

谢莫尼勒说，80年前，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伟大胜利。这场被世界史学界公认为正义对抗非正义、光明驱散黑暗、进步力量战胜法西斯反动势力的战争，广泛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面对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中华儿女并非好战，但为捍卫和平而战，义无反顾。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不仅捍卫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薪火相传，也为世界和平事业树立了不朽丰碑。“它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人民的图谋，向世界昭示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

的坚定信念，这是举世公认的真理。这场胜利凝聚了世界正义力量，赋予了全人类共同维护和平的强大价值。其意义之深远，堪称世界和平史上的壮丽篇章。”谢莫尼勒说。

在谢莫尼勒看来，中国人民抗战胜利80周年如同一面明镜，映照出中华民族对和平的坚定信念。二战后，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也是第一个签署《联合国宪章》的国家，始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中国始终倡导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长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积极参与战后重建，在联合国框架下为维护世界和平不懈努力。“这份对和平的承诺，既是崇高的政治愿景，更是庄严的道义担当。它有力回应了‘当世界携手中国，未来将如何’的时代之问。”

谢莫尼勒对记者说，在他看来，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回望80年征程，其深意并非沉湎于过往伤痛，而是向全人类发出警示：和平弥足珍贵，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捍卫。“从艰苦卓绝的抗战到蓬勃发展的21世纪，中国始终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推动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为全人类探索美好未来提供了中国方案。若能借鉴中国经验，汲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坚守和平的共同目标，世界必将迎来持久繁荣与安宁。”

习近平主席指出，“历史的记忆和真相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褪色，带给我们的启迪永远映照现实、昭示未来。”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正确的二战史观是建构战后世界和平的基石。然而，美西方国家却通过历史虚无主义、双重标准与话语重构等手段操控意识形态与舆论宣传，刻意淡化、歪曲中国在二战中的历史贡献，试图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正义根基。多国识人士已就此发出以史为鉴、共话和平、开创未来的正义之声。

编者按



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谢尔盖·费奥多罗夫

##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罪行不应被世人遗忘

中青报·中青网驻俄罗斯记者 赵祺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谢尔盖·费奥多罗夫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驻俄罗斯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军民为二战胜利作出的贡献不容被淹没，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中国的侵略罪行不应被世人遗忘。

“西方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长期致力于修改二战历史记忆”，费奥多罗夫表示，在审视欧洲战场时，他们试图淡化苏联在推翻纳粹德国政权中的作用，而将盟军诺曼底登陆描绘为二战的主要转折点。在审视亚洲战场时，他们又会突出美国和英国的贡献，将中国和苏联在击败日本军国主义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置于次要地位。

费奥多罗夫表示，在西方史学界，中国常常被描述为日本侵略的受害者，认为中国在击败日本军国主义进程中只是“被动参与”，“但事实上，这种叙述与历史现实大相径庭”。

“只需记住，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来说并非始于1939年，甚至也不是1937年7月，而是始于1931年，即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的那一刻。此后近15年，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浴血奋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费奥多罗夫说。

“在中国人民为自由和独立而浴血奋战的过程中，苏联给予了中国重要支持和帮助。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援助中国，是第一个援助中国抗日的国家，并于1945年8月出兵击败日本关东军，迫使日本接受战败现实。”

在费奥多罗夫看来，中国军民不仅为自身民族存亡而浴血奋战，其抵抗侵略的努力客观上也在消耗日本战争潜力方

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而在1941年至1942年苏联红军最困难的时期，挫败了日军进攻苏联远东地区的计划，“可以说，同盟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前，中国已在东方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以‘第二战场’的形式为苏联提供了战略策应”。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中国军民在这场战争中所遭受的巨大苦难和悲痛，我们怎能低估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费奥多罗夫说，中国人民为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据历史学家统计，1931年至1945年间，中国有3500余万名军民丧生，相比之下，美国在整个二战期间的损失约为40万名军人和4000名平民。“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长期抵抗和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不仅为盟军未来在亚太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最终在欧洲战场击败德国纳粹政权作出了巨大贡献。”

费奥多罗夫表示，近几十年来，西方越来越倾向于将日本人视为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朝鲜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侵略所造成的后果，却被刻意淡化和掩盖。

“日军的罪行和暴行似乎开始被遗忘，他们大规模处决平民，他们研制和试验生物武器，甚至对中国军人使用生物武器，其施暴的残酷程度至今令人发指。南京大屠杀就是这些暴行中的可怕例子。”费奥多罗夫表示，这些例子和德国纳粹分子及其帮凶德德拉分子在苏联所犯下的罪行，都必须被世人所铭记。

他表示，9月3日，中国将在北京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庆典，这将是一次铭记历史记忆，也是铭记同盟国为共同战胜世界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所作出的宝贵贡献的良机。



日本友人、文化学者、名古屋爱知县圆光寺住持大东仁

## 搜集侵华日军史料是走向和平的第一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贾沂蒙 见习记者 马子倩

在日本，有这样一位僧侣学者，自大学时代起便踏上了搜集二战时期日军侵略中国史料的道路，20余年来坚持不懈，将一批批珍贵资料捐赠给中国，旨在呼吁公众以史为鉴、珍爱和平。他就是名古屋爱知县圆光寺住持大东仁。

2003年，大东仁第一次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了日本军国主义美化宣传攻陷南京的明信片 and 照片杂志。他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说，当时，纪念馆中方工作人员对史料的珍贵性表示高度重视，并感谢他跨越国界，传递真相。

大东仁毕业于日本奈良大学文学部史学系，毕业论文的主题是“日本佛教徒的战时抵抗”。在准备论文的过程中，大东仁发现了二战时期佛教宣传的和平主义被日本政府否定、佛教教团在战争中配合军国主义的事实，同时他也了解到一些“反战僧侣”因挺身而出而被捕。加之他原本有出家的念头，这使他与这些站在反战前列的僧侣产生了深刻共鸣。

在这个契机之下，彼时还是大学生的大东仁开始借助旧书店、网络渠道等途径搜集史料。2004年起，在中方委托下，他开始了系统的史料搜集工作。有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8月，大东仁收集、转交及无偿捐赠给南京方面的史料已接近

4000份。如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陈列的《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的南京附近战斗详报》和《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三十六联队的阵中日志》等珍贵史料，都来自大东仁。

今年8月初，在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主办的一场中日和平友好交流会上，大东仁再次交给中方一批侵华日军照片和史料。他向记者介绍，这批资料中包含涉及日本“爱国妇女会”、侵华日军战犯柳川平助等相关主体的相册集。“史料搜集的目的，是通过保存与调查还原历史真相，进而反思侵略战争，并以此作为走向和平的第一步。”大东仁说。

因持续揭露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史实，大东仁曾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对，甚至攻击。但他认为，正因为这些史料承载着历史记忆，更需要有人保护和传播它们。攻击不会动摇他的决心，反而更坚定了他的信念。

今年，大东仁60岁了。他观察到，如今的日本年轻人中，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普遍存在认知差距。有人愿意了解真相，但缺乏历史资料，也有人被日本政府和社会片面的叙事误导，了解的是被歪曲的历史。他认为，唯有推动年轻一代全面、客观地认识历史，才能为中日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不仅是对历史尊重，也是对未来负责。”



新加坡南洋学会原会长许振义

## 为了公义 南侨机工为中国而战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马子倩 记者 陈小茹

追忆起86年前，3000多名南洋华侨机工从东南亚出发奔赴滇缅公路参与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新加坡南洋学会原会长许振义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特别提起一份日本战时档案资料。

1942年2月9日，在一份日本国家机密文件中，时任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给紧急时刻回国支援抗战的南侨机工扣上了“祸根”的帽子。6天后，当驻新加坡英军向日军投降、新加坡沦陷后，入城日军以“肃清”“检证”为由对亲英、反日的华人华侨进行了长达一周的大屠杀。

在许振义看来，这份由新加坡收藏家林少彬发掘而来的历史资料，是南洋华侨为抗战所作杰出贡献的一个生动写照。2023年，随着许振义参与编辑的《从征募到复员——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史》一书出版，更多人了解到了9批南侨机工背后“有血有肉的真人真事”。

“南侨机工”全称“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1939年，正当中国半壁江山沦陷，沿海港口又被日军封锁，弹药、药品等战略物资无法进入国内，滇缅公路成为战时中国西南大后方唯一国际通道，却面临司机与机修人员短缺的困境。

危急关头，在华侨领袖、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的号召下，共有9批、3200多人从新加坡出发，沿滇缅公路执行任务，保障战

略物资运输，以血汗和生命为亚洲重获和平作出重大贡献。许振义特别提到，南侨机工虽以“南侨”为名，但其中近百人并非华侨，而是印度人、马来人等南洋人士。这表明，维护和平、抵抗侵略是公义之举，即便他们并非华人，也依然愿意为中国而战。

当时，服务团中的许多华侨青年都是第一次回到祖国，他们遭遇了难以想象的现实困难和挑战。据许振义介绍，除了在战场上直面敌人的枪炮之外，云南山区的自然条件、陌生的社会民情也给南侨机工带来了巨大的难题，但“报国的激情冲淡了他们所受到的文化冲击”。1942年5月5日，为阻击日军沿滇缅公路入侵西南大后方，中国守军在日军侵犯至怒江西岸之际毅然炸断惠通桥，滇缅公路随之中断，南侨机工的车队被迫解散。

战后，有统计数据，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机工中，有三分之一在执行任务中牺牲，三分之一留在当地，仅有三分之一最终得以返回东南亚与亲人团聚。“不仅机工群体为抗战付出惨重代价，其家庭亦在背后作出了巨大牺牲。”许振义说，每年2月15日是新加坡“全面防卫日”，旨在纪念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遇难的平民，学校会开展断电演习等活动，强化年轻一代对和平与国防安全重要性的认知。

许振义表示，重温历史的现实意义是为了汲取教训、居安思危，同时要认识到，侵略者会以“东亚共荣”等各类借口来掩盖自身的野心，企图以妥协或绥靖换取和平，只会招致进一步的沦陷与苦难。

